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列宁斯大林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2

2000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 文 献

- 马克思 混乱..... (1)
列宁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35)

理 论 探 讨

- 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议员先生赞同和鼓吹的几个政治
经济学观点的反驳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38)

史 料 研 究

-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83)
关于列宁给斯克良斯基
的两封信 B. 洛吉诺夫(145)

1941 年的炎热夏季

——斯摩棱斯克战役期间国防

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文件选编

(1941 年 7—9 月) (149)

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 亚历山大·科库林、尼基塔·彼得罗夫(185)

人物与事件

斯大林年谱(十六)..... 项国兰 高晓惠(226)

新 书 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研究外文新书目..... 图 采(271)

卡·马克思 混乱(续二)

[372]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

1844 年法令(在其效果上)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一国内一切现有的金属等等转化为流通手段。因此,它企图使贵金属的流出=通货的收缩,贵金属的流入=通货的膨胀。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惟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 1844 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而 1857 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 1857 年 11 月 13 日至 30 日,按这 18 天平均计算,超过这个限额的银行券,每日达 488 830 镑。〔法定限额 14 475 000 镑+银行地库内的贵金属量〕《银行法报告》1858 年版(第 XI 页)。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国家之间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矿山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从 19 世纪初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对奢侈品的一般供给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在国

内的货币流通中被吸收。据估计，到 1857 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 3 000 万镑。此外，自 1844 年以来，欧洲（和美国）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通货从国内流通中被抽走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作为奢侈品的金和银的消费，由于（新时期内）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输出和输入；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贵金属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贵金属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平行的运动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决定：整个说来，贵金属是被输出，还是被输入。但也正因为如此——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人们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整体上的平行性。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像贵金属的输出和输入，是商品输出和输入关系的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贵金属本身输出和输入的关系。

第三，输出超过输入或者相反的现象，整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到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如此，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贵金属的过剩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而被吸收掉〔并以奢侈品增加为前提〕；其次，因为没有过剩输入，也会发生金铸币在国内的流出，这样，虽然没有贵金属输出的增加，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373]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如果对数量的影响是这样，那它把金属准备压

低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以致接近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么，贵金属的输出就只能采取“流出”的形式。同时，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的量，因为它是由银行法（有关银行券等等兑现的准备金）的规定（所决定的）。

第五，银行的金属准备基金的用途〔这种用途不能单独调节金属准备基金的形成，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 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实际上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 作为时面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铸币流通的准备金；3. 作为兑换银行券和支付存款的准备金，这和银行业务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基金，作为国际基金，也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不管支付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会受国内铸币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最后一种特性——作为保证金——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自发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币（一般是代替金，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地方，也代替银币），准备金的第二种特性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金，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消除贵金属在国内的流出，同时也要避免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铸币的停滞而增加金属准备。其次，被看作是为兑换银行券（和支付存款）的最低限额的那部分准备金，对贵金属流出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试图竭力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流出时，就可能发生像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

发。1825年、1847年(转变是4月底发生的)和1857年(转变是11月初发生的)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例如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贵金属流出,在这里始终只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贵金属大量流出(为支付谷物等),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尽管发生许多次商业萧条)。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贵金属(撇开多出的贵金属从生产国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其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假定所有其他情况相同,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虽然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力量的作用进行的,这些力量,我们在论述汇兑率的转变时已经提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就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出现流出。

第八,贵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汇兑率的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

[374]如果英格兰银行是一个不发行银行券而只实行金属流通的银行,那么,

“量金属流人的”后果就会是:“1)扩大存款并因而扩大金属准备;2)增加有价证券,并且不需要通过以低利息率对股票付款加以贴现;3)通过稳定的低利息率最终促进有效的经营,通过对汇票的贴现增加流通。”

“贵金属流出的”后果就会是:“1)影响银行的铸币准备(通

过贴现更多的汇票),而银行除此之外还握有为了保护存款所需要的贵金属量;2)影响银行所持有的存款,这只有部分地通过压缩有价证券,部分地通过压缩手中的硬币,才可能发生;3)作为这些措施以及其他原因的结果,则缩减了贸易和减少了流通。”(《经济学家》1847年第5卷第521页)

“苏格兰各银行把闲置的现金余额存在它们的伦敦代办处,例如存在琼斯、劳埃德等公司;这些代办处又把它存在英格兰银行。这种情形使苏格兰各银行在这个金额限度内拥有对英格兰银行的金属贮藏的支配权。在有对外支付时,它随时都可供人提取。”^①(同上)

贵金属的输入运动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在第一阶段,利息率低微,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在第二阶段,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它的平均水平。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通畅,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货币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首先只能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金和银)的回流,必然大地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调子。

另一方面,发生流出,即贵金属不断大量的输出运动;——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就表现出——回流不再通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对货币资本已有一定的需求压力,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

① 关于1845年法令所造成的金的流入和流出:“由于针对苏格兰的1845年法令,近来发生了英格兰银行铸币的大量流出,以便应付苏格兰境内只是可能发生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需求……从那时候起,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金额保留在苏格兰,而且有另一个相当可观的金额不断地往返于伦敦和苏格兰之间。如果某一时期一个苏格兰银行家认为对他的银行券的需求将要增加,那么,就会有一箱子黄金从伦敦运来;这个时期一过去,同一个箱子常常是原封不动又运回伦敦。”(《经济学家》1847年10月23日)

些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便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都处于紧张状态。^①

因此，它是崩溃的前奏。

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像一根将天平压向这边或是那边的羽毛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 500 万镑到 800 万镑的流出，即达到这一根据过去的经验得出的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一资本量，在例如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实际上多多少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②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

① (第 1520 号)(有人问纽马奇)“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像是这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报告，1857 年)(第 1522 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任何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本身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行在其他地方的购买，尤其胜任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同上)

此外，只要(在一般危险的情况下)出现银行贴现率的提高[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对这种情况的愈演愈烈的担心。因此，每一个人(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

②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抽走 500 万镑贵金属就是减少 500 万镑资本，现实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收缩或膨胀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就是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试图直接把这种结果解释为现实资本(从资本的物质要素来看)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

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使同应执行的职能相当的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贵金属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上述情况下,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375]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事情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枢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①我在前面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维持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题。^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即使把危机时期的这种“枢纽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由此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专门考察贵本时,启蒙经济学是极为轻视金和银

① “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一种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第1364号)(纽马奇,同上,委员会报告,1857年)

② 见《经济学家》,“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第5卷第1418页)

的，实际上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度，情形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现在，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单纯想像的东西），观念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同这种巨大要求相当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① 因此，在贵金属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过程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极为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产阶级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产阶级体系内表现得极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 1. 在资产阶级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产阶级体系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和幻想

^① 见查普曼的相关段落。

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

所有的汇票等等应该能立即兑换成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应该能立即兑换成金。〔此外，商品也应该能够如此〕

[376]〔(第 1426 号)(关于这一点，纽马奇的说法也被记录在案，见附录)结果是，这些数字表明，在流通的汇票额的变动和流通的银行券数额的变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等等〕(1857 年)

〔(第 1494 号)(纽马奇)“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贴现率的变化是按周期进行的；如果由于资本充裕和价廉而使贴现率很低，那就会按所应贴现的汇票量发生变化，就会造成国内交易和贸易的大幅度扩大……迟早会造成贴现率的提高，就可能或不可能(一般说来，是可能的)造成贵金属的流出……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贵金属的流出，都未必能超过 300 万镑或 400 万镑。”〕(同上)

〔(第 1499 号)(纽马奇)“大量贵金属被输出到英国之外，它必定是为了对输入英国的物品进行支付，是这样吗？”——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补充说：“在对英国为其他国家所负债务进行支付时，情形也是这样。试举东方贸易为例。众所周知，很大一部分是首先由英国以贵金属立即支付的差额，并不完全是为英国支付的；贵金属转送到东方是用来支付丝绸和茶叶进口所产生的债务，这些商品不仅进入联合王国，也进入法国，进入欧洲其他地区以及美国……大量转送印度的贵金属〔这里且不谈运往中国的〕，不是用来偿还英国欠印度的商业债务，而是为在印度投入建筑铁路的英国资本。”

(第 1504 号)(纽马奇)“大量的银被输送到东方，仅仅是作为汇兑业务；它既不是为支付差额，也不是为铁路投资，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汇兑业务。(第 1505 号)是投到对英国开出的汇票上吗？——是的。

(第 1506 号)这些汇票是针对装船海运到英国的商品开出的吗?——一般说来,是这样。”

(1509 号)1853 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 月,英格兰银行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1853 年)10 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11 月底以前有所缓和;而后因为有大约 500 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运抵,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 年秋,由于 10 月和 11 月运到大约 600 万镑贵金属,出现同样情况。1855 年,由于有大约 800 万镑贵金属在 9 月、10 月和 11 月运到,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后,在 1856 年……底……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纽马奇说:“的确,我可以借助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观察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

(第 1650 号和 1651 号)(纽马奇)“从现在回溯以往的 20 年(这个“现在”指的是 1857 年,而今已是差不多 30 年了)间,国内流通……在这些年的每一年中,都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周期。一个月高……另一个月低,在某一其他月份出现一个中间点。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发生……这种周期是由贸易或季节(例如收割)的特点以及其他事物的变化来调整的,这些特点和变化总是造成一个特殊时期比另一个时期更大的货币需求。”

[377]贵金属的外流。(第 1702 号)(纽马奇)“贵金属外流……可能是在纯商业的基础上发生,这就是说,输入超过输出(例如,从 1836 年到 1844 年主要是谷物输入,1847 年也是一样);也可能是由于……为英国在一些国外企业投资提供手段(例如,1857 年,由于英国在印度铁路投资等而使贵金属流向东方);或者还可能……为支付对外的开支,例如,1854 年和 1855 年支付克里木军粮的开支。”

流通。(第 1749 号)(纽马奇)联合王国银行券的流通总额大

约是 3 900 万镑〔(第 1749 号)(威尔逊)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流通的纸币面额小,流通增加大约 31%;而在英格兰,银行券的流通则保持不变。〕

(第 1750 号)“在联合王国不流通一镑券的那部分地区,金的流通额为 7 000 万镑。”

对亚洲的汇兑率。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例如,由于英国对亚洲的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它怎样必然从那些要由它作媒介从亚洲输入商品(就进行货币交易来说)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的量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例如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年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别的收入。这种贵金属的流出,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直接的货币资本和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只是在伦敦货币市场上的例如对印度开出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的程度上被输出。这就是说,对向印度开出的汇票的需求过多,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货币输送到印度去,从而产生对用来清偿这种巨额债务的一切手段的强大需求压力。〔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必然促使印度对英国商品

的需求增加,因为它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相反,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因此,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有这种影响,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似乎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一概而论,就纯属无稽之谈。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是铺在英国的土地上,还是铺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不提高利息率,在极为广泛的界限内,扩大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是说,有信用活动介入的交易量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既定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现实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么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通过国外投资限制了商业输出(输出产生货币的回流)(否则输出就会发生),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等等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378](第1786号)纽马奇认为,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对印度不利。1851年和1855年,英国的输出中:1851年是742万镑,从印度取来交给东印度公司作为本公司经费的资金=320万镑,从联合王国输出的总额是1062万镑。在1855年,输出额是1035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370万镑,联合王国输出总额=1405万镑。1855年,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只有1267万镑,有利于联合王国的差额是138万镑。

(第1787号)但是,威尔逊说,“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受向伦敦开出的汇票影响的,其影响同印度向英国直接出口商品完全一样。”

(1788号)[(第1789号)]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那么,对印度是顺差,对英国是逆差。(一般说来,中国对印度是债务人;而英国对中国又是债务人,于是便迂回地对印度成为债务人。)

(第1791号)威尔逊这头蠢驴问:“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所投资本是“以铸币的形式”或是“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进行而有所不同。

(第1792号)(纽马奇)“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么,这1200万镑的投资,只有在必须输出贵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支出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没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们怎么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纽马奇)我不认为,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支出,会影响汇兑率的计算……可以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的计算,只受到一国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之间的比例的影响;这是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对印度输出的这1200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如果交易的性质是这样的,即这1200万镑全部要以贵金属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种突然的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像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汇票由300万镑增加到1200万镑一样。然而,这1200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购买英国商品,例如铁轨、木材以及其他制造车辆和建筑车站的材料……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国,以便购买向印度输出的特种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第1798号)(魏格林:)铁等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大量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第1799号)威尔逊这个机灵鬼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

动，而劳动（它的价值）则大部分归结为由劳动者消费的“进口商品”。（第1800号）因此，如果将铁[轨]和机车输出用来支付这些进口商品，那么，它们就能使汇率平衡。（第1801号）“如果将那些要靠消费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输出，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率对英国不利吗？”——纽马奇从这个家伙的逻辑出发，甚至为自己举出一个例证。他说：“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投资时期在英国出现的。在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3 000万镑花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支付工资上。三年里在铁路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雇用的人数，比你们在整个工厂区雇用的人数还要多。这些工人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品都是进口的。”那么，结果如何呢？威尔逊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扭转了汇率吗？完全相反。“但是，事实是，在这种大量支出时期，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外汇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1802号）（纽马奇）“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其他国家的汇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率，必然造成对另一个国家的有利的汇率。”

但是，威尔逊这头蠢驴在（第1802号）中却坚持说，铁矿石和机车的超额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汇率”。（第1803号）他的庸俗见解：“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同样是资本的转移。”（第1803号）纽马奇回答他说，“债务”将会是这样。（第1804号）威尔逊由此同样作出错误的结论：“对英国资本（更一般的）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蠢货。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么，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他谈